

巴彦淖尔史料

第一輯

中共巴彦淖尔盟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巴彦淖尔盟行政公署地方志编修

巴彦淖尔史料

第 一 辑

中共巴彦淖尔盟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
巴彦淖尔盟行政公署地方志编修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三月

封面设计：郝文贵

封面题字：王福祥

巴 彦 淖 尔 史 料

第一辑

编辑 中共巴彦淖尔盟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巴彦淖尔盟行政公署地方志编修
印刷 杭 锦 后 旗 印 刷 厂 印 刷

内部材料 注意保存

前 言

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党史资料的征集和地方志的编纂都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搞好这两项工作，也是直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服务的。

我盟党史资料的征集和地方志的编修，在盟委、公署的重视与关怀下，已在全盟范围内广泛地开展起来。为了搞好资料的征集，我们编印了《巴彦淖尔史料》这一不定期刊出的集子，以推动全盟党史资料征集和地方志编修工作的深入开展。

《巴彦淖尔史料》是资料丛刊，编印的目的：（一）向社会广泛征集党史和地方史志资料，并为研究和发表这些史料提供阵地；（二）积累和交流有关资料，供全盟编写党史和地方志参考使用；（三）公开发表历史和现状的各种资料，也便于发动群众，征求意见，充实史料，以达到去伪存真，翔实可信。

本刊要亘古及今记述我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山川、古迹、要隘、物产等各方面的史实，为此，我们热切希望专家、学者和热心于党史、地方志工作的同志们，为本刊撰写文章，共同办好《巴彦淖尔史料》。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在编写中误谬之处在所难免，请领导和读者不吝赐教。

中共巴彦淖尔盟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巴彦淖尔盟行政公署地方志编修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巴彦淖尔史料

第一辑 目 录

	前 言
(1)	风雨十六年……刘进仁忆述 张 晔 田聪颖整理
(30)	在五原开展地下斗争的回忆 ………骆 时忆述 张晔整理
(34)	忆垦区暴动………杨明远忆述 张晔整理
(43)	郭北宸同志传略………杭锦后旗党史办公室供稿
(48)	巴彦淖尔盟历史大事记(1648——1949) ………李西樵 辑录
(73)	巴彦淖尔盟旗县历代疆域沿革 ………王 飞 辑录
(93)	河套农业发展小史………洪耶辛 高金荣
(121)	汉代故城考………
(134)	《河套史话》………王 飞
	唐虞三代有九州、十二州之说………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变俗开拓疆土………
(137)	抗日战争中包头、绥西和五原三个战役的回忆 ………安春山 宋海潮
(168)	绥远省乡村建设委员会与乡村工作指导员 ………刘映元 供稿 夏励秋 节录

(191)	冯玉祥在河套刘人俊 供稿 王飞 整理
(200)	吴佩孚过境五原刘人俊 刘静山 供稿 高常儒 整理
(205)	刘天佑“造反”纪闻.....刘人俊
(209)	阎锡山经营的绥西屯垦队王福田 供稿 夏励秋 整理
(221)	阴山岩画与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天道观盖山林
(233)	河套教区传教沿革.....
(257)	解放后巴盟行政区域的变更黄建斌 王飞 夏励秋 搜集 整理
(263)	巴盟旗、县公社、大队行政区划资料.....
(279)	告读者.....

风雨十六年

——河套地下革命斗争回忆之一

刘进仁 忆述

张晔 田聪颖 整理

一 建 立 支 部

一九二七年，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代替了北洋军阀，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当时，绥远和全国一样，国民党反动派活动猖獗，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绥远省党组织决定有计划地疏散党员，一方面对付敌人的白色恐怖，另一方面转入地下，深入农村争取群众，发动群众，开辟农村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

七月的一天，绥远地委组织部长路作林，正式通知我离绥赴河套开展工作，我欣然服从了党的分配。我按照党的指示，当即离绥到了包头，然后乘木船，沿黄河逆水而上，到达了临河。由于河水猛涨，航行艰难，几百里的水路走了一个多月。

到临河后，我首先找了李春秀和王汝贤二人，当时李是三区代表，王是东关小学教员，他们都是从反天主教而走上

革命道路的。李春秀远在“五四”运动时，在萨县巴拉盖天主堂教会学校上学期间，就鼓动和组织学生罢课，反对天主教。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我放假回套，曾在蛮会与李春秀及王汝贤有过联系，并将带回去的一些关于“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宣传品送给他们。由于他们亲身受过帝国主义与不平等条约的迫害，看了这些材料后，引起了共鸣，就积极行动起来。他俩当时都在蛮会教会学校教书，就组织学生罢课，反对比籍神甫林半吊子。

王汝贤画了一个洋神甫，跪在一个持枪的中国人面前等待枪毙，并写着：“洋灵魂下十八层地狱。”这画被林半吊子发现，见了王汝贤就打，结果反而被王打倒在地，这是洋教士从来没有遭受这么大的侮辱。当时人们听到这事后，无不拍手称快。事后，王汝贤被教堂取消了教员资格，不准再进蛮会城。李春秀支持王汝贤的行动，毅然也离开了教会学校，到了临河县城。因官府与教堂有矛盾，他俩的行动得到了一些上层人物的支持和同情，经活动李春秀当了三区代表，王汝贤到东关小学当教师。

由于我了解他俩的过去，又经过一段的调查和考验，确实不错，他们又积极要求入党，我就介绍他俩和一个叫王鞋匠的秘密入了党。时隔不久，我们四人成立了临河支部，我任支部书记，李春秀同志担任组织兼军事工作，王汝贤担任宣传兼农运工作。

当时临河是国民党的势力较薄弱的地方，既离归绥远，又是绥宁边界，土匪部队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相互对峙。包头以西由王英的护路队占据，临河以西至乌拉河是苏雨生的地盘，临河城里驻扎一个晋军营。陕坝、乌兰淖、蛮会操

于天主堂手中。这种混乱的局面，对我党开展工作是有利的。地委指示我们：“隐蔽好，秘密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迎接新的革命斗争。以绥远斗争的经验教训，做好农运、军运及青年知识分子工作。”

支部成立后，根据河套当时的形势和上级党组织指示的精神，拟定了支部工作计划。总的原则是：深入群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通过斗争发展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并要作好隐蔽工作，既要抓住主要斗争目标有的放矢，还要机动灵活地确保我们的力量。方法是：以统一战线的办法壮大革命力量，以公开合法的工作来隐蔽秘密工作，利用“上层”掩护“下层。”具体步骤是：第一步先拿到工作阵地，找到公开的职业以作立脚点；第二步再从反帝开始，开展全面工作。

二 合 法 身 份

支部成立后，我和李春秀、王汝贤商量，党的工作先从哪打开局面？我们一致认为，从教育上打开局面最有条件。当时临河全县只有水桐树庙、同元城两地各有一处私塾，县城东关有一所半私塾性质的小学，全县没有一所公立小学。因此，群众对开办公立小学要求十分迫切。天主堂统治的地区，他们为了以迷信奴化、毒化青少年，办了许多小学。陕坝有男女两个高小，三盛公还有相当于中学的神学院，基本上成龙配套，形成了体系。由于没有学校，许多非教徒也把子弟送到了天主堂学校，估计当时在教堂学校上学的人数有一千六、七百人，算上磴口就有二千三百多人。再则，一九二四年以北京学者的名义，召开了一次中华全国教育会议，

提出过收回教堂教育权的问题。

这样在教育界开展工作有许多好处：一是广大群众盼望有自己的学校，以办学为名可以串联和发动群众；二是可以发动知识分子；三是人们对天主教堂非常痛恨，夺回教堂教育权的斗争群众易于接受；四是可以麻痹上层，利用县政府和一些官吏曾表示办学的义举，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便于以后开展工作，我们就开始积极活动，寻求公开合法身份。

我回临河县以中学肄业生的面目出现，当时，一些上层人物只以为我是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又是初换青天白日旗，他们对我还有点望而生畏。利用这种有利条件，我就在教育界开始了活动。当时教育局长王丕卿，他是一个老夫子。一九二七年初，当过几个月的临河设治局长，卸任时被接任的孙国栋讹诈过五百元大洋。有些人为之不平而联名告孙，李春秀给我去信，我在绥远曾帮过他的忙，给了孙以极大的打击。因此，我到临河王丕卿对我非常热情。他也想作出点成绩，对我提出办学的想法表示支持。在我的说合下，王丕卿把李春秀从三区调回来当了视学，开始建校的筹备工作。

临河设治局长孙国栋大概是害怕的原因，见了我更为殷勤，请客招待并委任我为临河教育督导员。虽然这是一个空名义，实际在我看来是个很理想的职务。

当时河套是大地主兼地方董事专权的局面，财务、水利与四个区的区长等重要职务都由他们分掌，把持一切，任意而为。他们吞食流通券，贪污军粮税物，霸占土地，奸污良女。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他们怕再落个孙国栋的下场，对

我也表示欢迎。

这样我和李春秀取得了合法身份，开始了建校活动。

三 第 一 回 合

兴办学校这是反动统治者一贯口头上所标榜的，但都是空谈而已。当我们和教育局提出立即修建学校时，孙国栋口头上同意，但又以没钱为借口让推迟修建。我们知道孙又在耍滑头，来个先斩后奏，逼他上梁山。经李春秀同志和王丕卿的努力，以七凑八拼的办法搞了些木料，开始动工。

这时，听说绥远党组织遭到了破坏，支部及时研究了对策，要提高警惕，防备组织遭到破坏。同时决定我到宁夏找党的关系，如找不到再到武汉。到宁夏计划找西北军与内蒙人民革命党的关系，因为西北军中有不少我党的同志。在内蒙人民革命党方面，有李若愚、王德尼玛和以后叛变革命的白云梯。我在九月间到了宁夏，一打听西北军已经变样，白云梯已经叛变，李若愚同志情况不明。我知道事情坏了，如一露头叛徒白云梯就会知道，有被捕的危险，武汉也失去了希望，只得返回临河。

十月间我回临河时，学校已经盖起两座教室与八间房，连原有的四间共十八间。在我未回临河的前半月，已由李春秀同志主办，请了一个老秀才赵兴安当教员，并把东关学校原来的学生招收来，已经开了学。我回来就正式担任了校长。值时，驻守临河城里的晋军撤退，晋军县长（当时已改为县）也随军离去，就在这三不管的空子里，王文樾当了临河县长，他为了维护其地位，对我们办学也示以支持。这样我们的工作比较顺利，到冬天学生达四十

多名。

一九二七年冬，全国的形势有所好转，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海陆丰起义给予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在支部会上研究决定，继续以办学为名，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并派李春秀同志到蛮会、陕坝、乌兰淖一带活动。乌兰淖有个叫温七斤子的人，是个反天主教的积极分子，他原是乌兰淖教会学校的教员，因反教会被革职。我们利用他的这种精神，由教育局下令让他在那成立公立小学。天主教的洋神甫说：

“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不准别人成立学校。”我们说：“你还占着我们的地盘，赶快滚出去。”当时教育局设在小学，有些重大事情由我来负责，我们坚决办这个公立学校，与天主堂展开斗争。李春秀同志以教育局视学身份帮助创办。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再加上李春秀和温七斤子的努力，学校很快办起来了。

比籍神甫林半吊子（后到了乌兰淖教堂）看到办起了学校，非常气愤，他一方面用教义威胁学生家长不让学生到公立学校念书，另一方面派他的爪牙打钟老汉到学校捣乱。这个老汉开始是手持一根大木棒，在街上吓唬上学的孩子，不让他们到公立小学上学，学生们根本不怕他的威胁。这个家伙还不死心，后来索性跑到学校乱打一通，并喊着：“神甫的命令，不让你立学校，你们是魔鬼学校。”在他的起哄下，学校被哄散了。

温七斤子没办法，跑到县政府报告，县长和教育局长有点怕洋人，对这件事唯唯诺诺的不敢处理。我见王文樨畏首畏尾态度犹豫，马上写了一个条子，大意是说中国让他们（指洋教士）传教，并不是让占中国的地盘，就是不平等条约

上，也没有规定不准中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办学校，又何况这种不平等条约我们现在已不承认。这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政府官吏是职责所在，怎能容忍这种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呢？现在应当马上办理这个案子。

当时，有些地方绅士也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说：“刘校长提的对，不平等条约上没有这一条。”这时都认为林半吊子是不可理喻的，非给点武力不行。让我带上几个护路队的兵去办理这件事情。为了办事有依据，不让县政府推卸责任，我让县政府给出了个指令。我们到了乌兰潭，温七斤子详细汇报了情况，并说打钟老汉仍继续捣乱。

我听了后立即派兵到天主堂抓这个走狗。这几个兵马上行动，进了教堂院二话没说便朝天鸣了一枪。林半吊子听见枪声，知道事情不妙，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后门偷跑了。抓来打钟老汉后，我问他为什么捣乱，他说：“我是听林神甫的命令办的，我是吃人家的饭，捞人家的家。”洋奴气十足，当时把他管了起来。这时候又把三甲公会负责人叫来，该人是天主堂的会长，是一个典型的洋奴。我对他不客气地说：“你是政府系统的负责人，对于国家办学校是有责任的，在你们村里出现这种事，你为什么不管？”这个家伙吓得直哆嗦，点头哈腰地应承负责把公立学校恢复起来。还答应把天主教学校的四十套桌凳搬来让公立学校使用，让打钟老汉给公立学校拉四十车柴禾，如果以后再有人捣乱，完全由他负责。

我于当夜在反教会积极分子金良家里开了群众会，在会上讲了形势，揭露了林半吊子和天主堂的种种罪行。也谈了大家要觉悟起来，为了培养自己的子女，把公立学校巩固下

来。群众非常拥护办学，表示大力支持。第二天学生们都兴高采烈地到了学校。

天主堂并不甘心失败。林半吊子跑到三盛公找到他们会长狄文化神甫，谈了乌兰淖的事。狄出面告到归绥，说：“临河两级学校校长刘进仁带兵鸣枪示威，宣传共产主义，捣乱天主堂治安。”

一天，王丕卿告诉我，说三盛公天主堂的狄神甫把我告了，省政府下来了指令。我一看指令，上面写着：“据天主堂司铎狄文化呈报，共产分子刘进仁带领人马到乌兰淖鸣枪示威，扰乱地方治安，宣传共产主义，速予查办。”下边案语是：“查刘进仁确系共产分子，见电立捕，速解来绥，以凭核办。”王丕卿有点害怕，为了使他们对我不会发生怀疑，便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一场官司，它不能只听洋人一面之词。天主堂捣乱学校，这不只是我的官司，也是县政府、教育局的一场官司，我要是输了县政府和教育局也就算输了。”他们一听也觉得有道理，县政府研究决定，第一，让我暂时隐蔽起来，少出门，防止绥远派人来看见。名义上让王文辉的女婿接替了我的校长职务，实际上仍让我继续主持两级学校的工作；第二，搞到三甲公会的具结完案的字据，有了字据这个案子就可呈报完案。

县长王文辉马上签字传来乌兰淖三甲公会负责人刘三保、段富治，立即开庭审讯。我们为了给县长出主意，让李春秀和王丕卿坐在大堂后面，作为策应。

开庭时王文辉就问：“你们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刘三保答：“回大人老爷，我们是中国人。”

王问：“你们担任甲长是给谁当的？是对谁负责？”

段答：“是对政府负责。”

又问：“那为什么林半吊子捣乱学校你们不管？”

这俩个人一看风头不对，赶忙说：“这是林的胡闹，实在对不起我们的责任。”

又问：“刘进仁到乌兰淖尔有无轨外活动？”

俩人回答：“没有。”说出这句话就达到审讯目的了，当堂画押，送到狱中。然后他俩写出了书面材料，说狄文化向绥远的报告“完全是无理的”，刘进仁并无“轨外行动”，经县批准具结后释放。这俩人气不过，去找林半吊子，林也无可奈何。然后又到陕坝天主堂找会长王乐天，王把他俩骂了一顿。过了两个月，绥远都统换了人，案子也就没事了。

为了与天主堂争夺教育阵地，李春秀同志到陕坝、蛮会一带活动，动员天主教堂的学生到临河两级学校上学。先后动员了六、七名较大的学生，退出教会学校到临河上学，如革命烈士瞿秉杰就是其中之一。有的天主教会长的儿子也退出了教会学校，到了临河。因此，陕坝天主教的洋神甫鲍某，对李春秀最恼火。

有一次，李春秀同志到天主堂高小动员学生，可巧碰上了鲍某，企图阻拦。李春秀愤怒地说：“咋啦！这是你们的地界？这是中国的地方，怎么不许中国人来？我是县里的视学，到学校是我的责任，你要干涉可就没有你的好处。”鲍知道李春秀同志不好惹，他怕再落个林半吊子的下场，灰溜溜地走了。事后打发他的狗腿子来给李说好话，央求再不要来动员学生了。李春秀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是不是中国人？”狗腿子直点头，“你回去告诉姓鲍的，我这才是开

始。”之后，李春秀经常到教会学校动员学生，有一次凑齐了六、七个学生，他自己花钱雇了一辆牛车，送到了临河县城上了学。有两个学生膳食费困难，我们党员同志出钱包了下来。

一九二八年暑假，在蛮会建立公立学校，天主堂扬言不让在他们地界内办学校，由于多次较量他们吃了苦头，因此，只是利用教条暗中破坏，不敢明目张胆地捣乱。我们才不管他那一套，借了民房办起了学校，一开学就有八十名多学生，比天主堂的老学校人还多。由王汝贤任校长，聘请了一个上过私塾的商人当教员。从此，蛮会的工作也有了发展。

四 福祸同来

前段工作虽然遇到了许多麻烦，但总的说来还是顺利的。可是，我们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快半年了，就象娃娃失了娘，没有依靠。支部研究要千方百计地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

一九二七年十月，奉军赶跑了晋军而占了绥远，勾结晋军与我党为敌的国民党匪徒也跟着逃跑。我们考虑到党在归绥工人中基础较好，于是给归绥毛织厂技术工人党员钟金声去了一封信，信上编了一段话：“河套有很多绒毛，资金也有了，打算开毛织厂，就差一个老师傅，你们如有老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下，弄上付机器就可以开工了。”

过了几天就接到来信，具名是贾昕晨（这是李子光同志的别名，他原叫贾一中）。信上说，他已结了婚，要搬上女人住娘家去，还写了些别的话。我一看就知道这是组织内部